

中国慈善研究发展的阶段性及其解释

——基于文献的关键词分析

宁玉梅¹ 林卡^{1,2}

(1.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学 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如何把握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是当前慈善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1993—2019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慈善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可以总结出我国慈善事业和慈善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2007年),研究重点在于慈善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问题;第二阶段(2008—2015年),研究议题扩展到组织公信力与制度建设等焦点问题上;而在现阶段(2016年以来),慈善研究侧重于慈善法、互联网公益和社会治理等新的议题。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不断演化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也展示了慈善事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下一阶段慈善研究的焦点在于个人捐助行为和网络慈善。

[关键词] 慈善事业;公益慈善;非营利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政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逐步推进,并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目前,中国社会捐赠年度总量已突破千亿元,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头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慈善捐赠就超过了290亿元^[1],为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此同时,慈善活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常常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和争议,例如湖北红十字会事件就引起了公众的质疑^[2]。这为我们反思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案例。目前,学界对慈善问题的研究大多围绕三个方面的议题展开,即慈善行动者的动机(包括企业和慈善组织的行为),政府与民间机构在慈善活动中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和演化的进程。这些研究相互补充,为探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机理和条件提供了逻辑基础。

关于慈善动机的研究,有的强调慈善活动的道德动机^[3],也有的关注慈善行为的发生条件以及现行制度和环境氛围等因素对慈善活动的影响^[4]。有学者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助活动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是为了减小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增进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联系^[5];也有学者把慈善行

[收稿日期] 2020-03-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1-04-1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9ASH016);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浙江敦和基金会项目

[作者简介] 1. 宁玉梅(<https://orcid.org/0000-0002-9440-0501>),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研究;2. 林卡(<https://orcid.org/0000-0002-5282-0241>),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社会科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研究。

为看成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途径^[6],或者是企业与政府互动的一种战略行为^[7]。在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相互关系上,有学者指出,慈善组织的行政化运作会抑制其组织能力的发展^[8];也有学者强调,政府本身也要通过角色调适来适应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9]。

与上述讨论相关联,我们需要探索中国慈善事业体系的发展或演变进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把这一过程划分为整顿(1949—1956年)、禁锢(1957—1980年)、正名(1981—2001年)、倡导(2002年至今)四个阶段^[10];也有学者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参照,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国家化(1949—1978年)与社会化(1978年至今)两个阶段^[11];还有一些研究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把慈善事业发展进程分为复兴阶段(1981—1994年)和初步发展阶段(1994年以后)^[12];或者结合政策体系的变化,将这一过程划分为探索期(1978—1993年)、正名期(1994—2003年)、发展期(2004—2015年)、转型期(2016年至今)四个阶段^[13]。上述这些讨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慈善体系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为我们把握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图景。

当然,这些讨论也存在种种问题。有的讨论虽有依据,但往往缺乏经验资料的支持,主观成分较多,难以获得共识。也有一些讨论停留在历史性的宏大叙述中而疏于对具体问题展开分析,缺乏实证分析,难以客观地反映慈善活动具体内容的变化及变化原因。还有一些研究强调国家在慈善事业中的主导作用,对公民、企业等社会主体的行动逻辑分析不够,在慈善研究中缺乏社会性的视野。因此,如何有效地确立经验证据或资料基础以说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提升解释力度,已经成为深化慈善研究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来讨论这一问题。本研究收集整理有关慈善问题的研究文献,力图在实证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分析。由此,本研究并不人为地设立划分体系演化阶段的标准,而是依据慈善研究的现实状况(数量和议题的变化等)来客观地展现这一进程。同时,本研究也把慈善研究状况与重大历史事件和国家政策等现实驱动因素关联起来,使研究沿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文献资料的分析来确立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节点;二是立足于事实证据来考察慈善研究中的焦点事件和议题变化,为讨论慈善事业的演化提供事实基础。这两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特点、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

二、中国当代慈善体系和慈善研究的发展状况

中国慈善事业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如果以慈善捐赠总量作为测量指标来进行考察^①,可以看到其在总量上的明显变化,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图1)。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7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量的增长十分缓慢,而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事件的影响下,这一数据在2008年和2010年出现了陡增的现象。随后,在2011—2017年,慈善捐赠总量逐年递增。这些变化为我们划分慈善事业的发展阶段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在慈善研究方面,我们在中国知网以“慈善”或“公益慈善”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获得1980—2019年收录的15 000余篇期刊文献(图2)^②。按照年份区段划分,可以看到,1980—1993年慈善研究的

①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有关慈善捐赠的统计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由于在不同时期慈善捐赠的统计部门和统计口径不一,本研究汇总了相关数据:1999—2006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社会捐助统计报表,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P0A&sj=2018>;2007—2008年数据来源于这两年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09—2018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② 检索文献分类目录包括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同时,本文主要讨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状况,善会善堂、慈善人物等慈善史研究文献不包括在内。检索截止时间设置为2019年。

文献数量还很少,并且数量的变化趋势也不明显;1994年以来,慈善研究的文献数量有所增加,2004年之后增长较快,并在2008年形成了第一个高峰;但2016年之后,慈善研究的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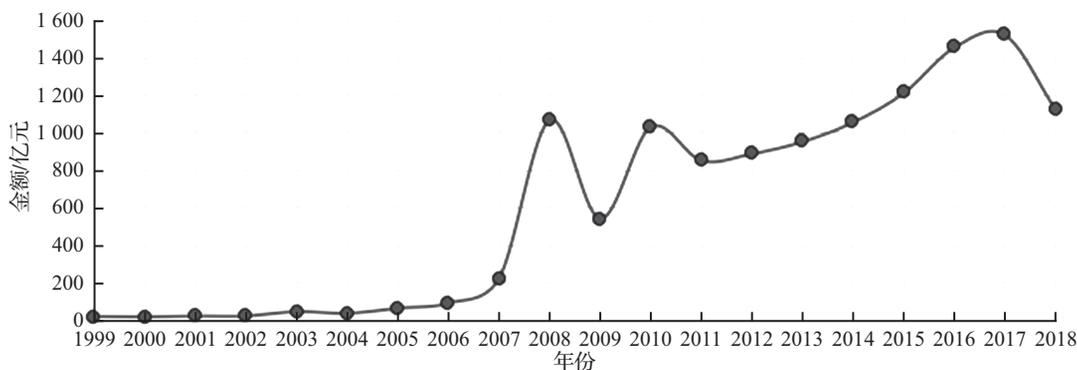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慈善捐赠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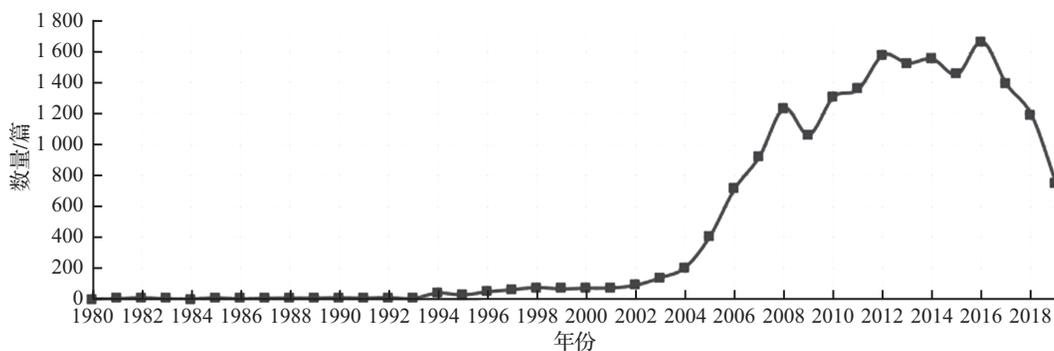


图2 慈善研究的期刊文献数量

将以上慈善捐赠总量和慈善研究文献数量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者在总体上呈现出相对一致的变化趋势(尽管这种变化并不完全对应)。在图1和图2中,2008年和2016年这两个年份都是重要的时间点,与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和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颁布等重大历史事件相呼应。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2008年和2016年作为时间分割点,把中国慈善研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以2008年之前为第一阶段、2008—2015年为第二阶段、2016年以来为第三阶段。为了分析和说明这些变化,以下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来揭示变化的原因。

本研究采取文献计量方法对慈善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词频分析和聚类分析。关键词词频分析可以呈现出议题的变化^[14],而聚类分析则把关联密切的关键词聚集在一起形成簇群,以反映不同群落的关系^[15]。本文运用ITGInsight^[16]和CiteSpace^[17]两种文献计量软件来展开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从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到的15 000多篇文献中提取其中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论文作为分析样本。在排除新闻报道、会议通知、会议综述等条目后,最终得到1993—2019年的学术期刊论文1 774篇。在对文本格式、关键词进行预处理^①后,通过ITGInsight软件筛选出每年前二十位的

① 关键词预处理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关键词补充,由于早期一些论文存在关键词缺失的情况,本文结合论文标题和内容对关键词进行了补充;二是明确关键词的指向,特别对企业慈善捐赠和个人捐赠进行了区分,将明确指向企业的慈善捐赠统一为“企业慈善捐赠”、指向个人的慈善捐赠统一为“个人捐赠”;三是对同义关键词进行合并,例如将“慈善基金会”“公益基金会”统一为“基金会”,将“慈善公益事业”“公益慈善事业”统一为“慈善事业”。

同时,聚类群落5(企业社会责任)反映的是学界对企业慈善理念和捐赠行为的研究。其中,“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慈善捐赠”“战略性慈善”等关键词常常出现,显示了研究者对发展企业慈善的期望。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逐渐流行,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战略性慈善”等概念也广为流传。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慈善活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各种方式来推进企业慈善活动的发展。这种状况也激发了研究者对企业慈善问题的讨论热情^[20]。

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聚类群落1(非营利组织)和聚类群落4(慈善组织)中看到研究者对各类慈善组织的关注。中国慈善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但直到2001年,全国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只有172家^[21]。在21世纪初,中国慈善组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到了2007年末,从事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已达到5万余家^[22]。这就促使研究者强化对慈善组织议题的研究。在这些讨论中,聚类群落1(非营利组织)体现了研究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国外慈善事业发展等问题上^[23];聚类群落4(慈善组织)则指向政府与慈善的议题,探讨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关系,促使人们反思参与慈善活动的各方主体所起的作用及其互动关系^[24]。

在慈善体系的发展方面,聚类群落2(慈善事业)和聚类群落3(和谐社会)则聚焦慈善事业发展与国家政策之间的联系。在2004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后,一些研究将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相结合^[25]。国家也制定了相关的支持政策,例如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使企业基金会的数量从2004年的16家增长到2007年的100家^[26]。同时,在政府管理中,如何在与慈善相关的社会事务中克服各种制约和阻碍因素,建设和谐社会,也成为热点议题^[19]。在这一阶段,民间慈善组织的力量还十分薄弱,政府成为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并形成了“官办慈善”^[9]的特征。

(二) 第二阶段(2008—2015年)

在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二阶段,2008年相继发生的冰雪灾害、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等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民众进行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的积极性。由此,2008年被称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这一发展态势在2011年遭遇危机。该年发生的郭美美和卢美美等事件触发了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使慈善成为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2008—2015年慈善研究论文达到1049篇,大大多于前一时期的总量。在研究议题的变化(参见图4)中,“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慈善捐赠”仍然是焦点议题,但在前一阶段中具有高热度的“慈善事业”和“和谐社会”这些关键词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对“慈善组织”的研究热度持续上涨,而一些新的议题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公信力”“慈善立法”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显著增加。

从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参见表2)中可以看到,聚类群落5(慈善文化)反映出学界在慈善动机和慈善行为方面的研究有所强化。同时,聚类群落2(美国)和聚类群落3(慈善组织)反映了学界对立法、透明化等组织运作问题的高度关注,“公信力”“慈善立法”“信息公开”“信息披露”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很高。特别是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促进了人们对慈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讨论,学者们围绕公信力内涵、公信力缺失的原因以及如何重塑公信力等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7]。

这一时期发生的捐赠排行榜等事件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28],反映出社会对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期望和要求明显提升。聚类群落0(企业慈善捐赠)中关于企业慈善研究集群的关键词已经不再局限于企业社会责任等理念,而是进一步探讨“企业慈善行为”“企业公民”“企业绩效”“民营企业”等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对企业慈善活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引介深入到中国企业慈善行为的特点、动机和影响因素的探索^[29]。

表2 2008—2015年慈善研究关键词聚类

聚类标签	聚类大小	轮廓值	主要内容
#1 慈善	15	0.664	慈善事业、慈善、政府、社会救助、第三次分配、慈善意识、和谐社会
#2 美国	13	0.831	基金会、美国、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信息披露
#4 慈善捐赠	7	0.962	慈善捐赠、汶川地震、税收激励、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0 企业慈善捐赠	18	0.872	企业慈善捐赠、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慈善、企业慈善行为、企业公民、企业绩效、民营企业
#5 慈善文化	4	0.917	慈善文化、现代慈善、传统慈善
#3 慈善组织	13	0.672	慈善组织、公信力、慈善伦理、慈善立法、信息公开

在发展导向上,聚类群落1(慈善)延续了此前的慈善事业与和谐社会的语境,但在2008年之后,“和谐社会”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与此同时,完善慈善制度,推进慈善法治化建设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从聚类群落4(慈善捐赠)中的关键词变化所反映的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税收政策”成为慈善捐赠新的焦点问题。研究者批评慈善税收制度的不完备、优惠力度不足、税收减免程序复杂等问题限制了慈善捐赠的发展^[30]。例如2009年11月,国家财税部门出台的免税政策因压缩了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税范围而遭到24家机构的集体质疑和抗议,这些情况也引发了业内人士对慈善税收制度问题的广泛讨论^[31]。

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慈善发展、慈善捐赠以及企业慈善等问题依旧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主题,但税收政策、信息公开、公信力、慈善立法等主题的热议反映了研究者关注焦点的变化。在价值基础方面,慈善的公益性质受到人们的倡导,慈善事务逐渐由政府或准政府组织的管理工作变为社会参与的公益事业。这使前一阶段所强调的慈善组织管理以及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议题在研究中有所淡化,而法治化建设被看成维护慈善公信力、促进慈善行为的基本保障。由此,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透明化、法治化的要求日益提高,加快推进慈善事业的立法进程被提到相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32]。

(三) 现阶段(2016年以来)

2016年,《慈善法》在历时十余年的讨论后正式颁布,这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明确了指导思想 and 制度架构。由于人们前期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在《慈善法》中得到了回应,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有所缓解。不过,虽然《慈善法》针对许多慈善问题设立了原则,但如何在制度建设层面上进行运作仍然面临许多困境,尤其是当前有关社会组织的三大条例尚未出台且充满争议。这使研究者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持观望态度,导致慈善研究论文发表数量有所下降(参见图2)。在研究议题上,从对2016年以来发表的534篇论文的关键词分析中可以看到(参见图5),以往讨论中的一些关键词,譬如“企业慈善捐赠”“慈善组织”等,依旧是年度热点词汇,同时,一些新的关键词开始流行。例如,《慈善法》的颁布促使“慈善法”一词的词频明显上升,而“网络慈善”和“互联网公益”等话题也正在成为慈善研究新的热点。

对这一时期研究论文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参见表3)表明,聚类群落0(企业慈善捐赠)反映出企业慈善研究中,企业捐赠、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依然是关注重点。聚类群落1(慈善组织)中“互联网公益”和“网络募捐”等关键词反映出在互联网时代慈善体系发展的新特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公益众筹、网络募捐和微公益等新的慈善模式,从而使人人慈善、大众慈善成为可能。这也衍生了一些新的管理问题。例如,“罗尔事件”“轻松筹”等骗捐诈捐事件促使人们关注互联网时代的诚信建设和公众监督的意义^[33]。此外,在聚类群落2(美国)中也涌现了诸如“慈善信托”“社区基金会”等新的关键词。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意见》提及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全国社区基金会的数量也从2016年的109家^[34]增长到2019年的158家^[35]。这一背景促使学界对如何推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进行讨论。

表3 2016—2019年慈善研究关键词聚类

聚类标签	聚类大小	轮廓值	主要内容
#0 企业慈善捐赠	18	0.962	企业慈善捐赠、企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企业绩效、企业慈善、企业、政治关联、财务绩效
#1 慈善组织	15	0.895	慈善组织、慈善法、社会组织、互联网公益、基金会、社会治理、网络募捐、社会工作
#2 美国	14	0.907	慈善捐赠、慈善信托、美国、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社区基金会、税收优惠

再者,聚类群落1(慈善组织)中的“慈善法”“慈善组织”“社会组织”和“基金会”等关键词反映出《慈善法》颁布后如何有效协调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仍然是关键问题。这使一些研究强调,《慈善法》在立法思路仍带有行政管理的烙印^[36],并指出慈善组织的登记、认定和管理等方面的规则也有待进一步完善^[37]。此外,该群落也包含了“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关键词,反映了慈善研究的发展由第二阶段的社会保障、和谐社会转向了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的新方向。在下一步的推进中,慈善研究的焦点逐渐扩展到互联网公益、社会治理和社区基金会等议题上,反映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激发社会组织功能、强化社会协同治理都将成为慈善发展的新方向。沿着这些方向,中国慈善事业将借助新的技术条件和法制建设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ITGInsight和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1774篇期刊论文进行了关键词词频和聚类分析。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按照时间序列展现了慈善研究论文的主题变化,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了中国慈善领域研究的状况和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问题。同时,结合社会公共事件和媒体传播事件来解释慈善研究议题变化的现实原因,从而强化了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的内在联系。显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慈善研究的议题领域在不断地扩大,内容也在不断充实。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揭示了中国慈善研究和慈善事业发展的阶段性。这一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2007年),慈善研究的重点放在慈善事业发展的推进上;第二阶段(2008—2015年),慈善研究逐步深入到慈善组织透明度、公信力建设和慈善组织的监管等问题;第三阶段(2016年以来),在《慈善法》颁布的推动下,慈善研究的法治化、规范化基础得以确立,从而使慈善研究向社会治理、互联网、社区基金会等议题扩展。这些议题的转变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形态和机制的变化。采用关键词词频和聚类分析作为依据,我们可以避免对这一发展进程进行主观化和碎片化的解读,从而更为客观地理解慈善研究内容的变化及其现实背景。

当然,在词频分析和聚类分析中我们也看到,慈善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数还不够显著,尚未形成研究的主题集群。例如,“志愿主义”和“志愿者”这些主题与慈善事业密切相关,在慈善研究中出现的频数应该很高,但在实际分析中这些概念的词频并不高。这表明在慈善研究中对民间慈善行为和个人慈善动机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这也反映了目前在慈善研究中体系性的和事件性的讨论较多,而在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对慈善行为模式和动机的研究还不够。此外,互惠主义、利他主义、博爱等涉及慈善伦理的词汇频数也不高,这与国际上关于慈善问题的讨论的惯例存在一定的距离。这种状况也从特定的角度解释了中国慈善捐赠总量和人均捐助金额低于发达国家

水平的现象。

同时,在聚类分析中我们也看到,一方面,随着慈善研究的深入,词群构成的集群量在增多,内涵在丰富;但另一方面,在这几十年中,集群的主题变化并不大。这些集群主要有三类:一是慈善事业的体系和制度分析;二是社会组织分析;三是企业慈善的分析。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涉及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第三个方面则涉及慈善资源潜力拓展的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和谐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等与慈善政策和社会组织相关的词语出现频数很高,但对个人捐助行为与互惠主义,以及互联网技术、网络慈善和互联网捐助平台的建设等议题的研究目前还不多,尚未形成独立的聚类,而这些议题恰恰构成了下一阶段慈善研究的焦点问题。因而,在未来的慈善研究中,我们需要结合慈善实践的现实发展,进一步扩展和更新研究视野,以展现慈善事业的多元化发展状况,推进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王勇:《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292.9亿元》,《公益时报》2020年3月10日,第5版。
- [2] 杨宏斌:《省红十字会3名领导被问责》,《湖北日报》2020年2月5日,第2版。
- [3] 武晓峰:《情感、理性、责任:个人慈善行为的伦理动因》,《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2期,第106-111页。
- [4] 刘新玲:《论个体慈善行为的基础》,《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81-85,114页。
- [5] 钟宏武:《企业捐赠作用的综合解析》,《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2期,第75-83页。
- [6] 田雪莹、叶明海、蔡宁等:《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实证分析》,《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73-778页。
- [7] 李维安、王鹏程、徐业坤等:《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南开管理评论》2015年第1期,第4-14页。
- [8] 罗文恩、周延风:《中国慈善组织市场化研究——背景、模式与路径》,《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第65-73,89页。
- [9] 林卡、吴昊:《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32-142页。
- [10] 吴显华、欧阳风莲:《中国慈善事业政策的变迁及启示》,《前沿》2012年第7期,第107-109页。
- [11] 汪大海、唐德龙:《新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结构与路径依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5期,第114-119页。
- [12] 周秋光、曾桂林:《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前瞻》,《文化学刊》2007年第5期,第14-22页。
- [13] 陈斌:《改革开放以来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转型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第148-159页。
- [14] 陈云松:《大数据中的百年社会学——基于百万书籍的文化影响力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23-48,242-243页。
- [15] 钟伟金、李佳、杨兴菊等:《共词分析法研究(三)——共词聚类分析法的原理与特点》,《情报杂志》2008年第7期,第118-120页。
- [16] 刘玉琴、汪雪锋、雷孝平等:《科研关系构建与可视化系统设计与实现》,《图书情报工作》2015年第8期,第103-110,125页。
- [17]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242-253页。
- [18] 钟宏武:《中国企业慈善捐赠》,见陈佳贵、黄群慧、彭华岗等主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2-248页。
- [19]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学海》2007年第3期,第62-67页。

- [20] 周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价值》,《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523-526页。
- [21] 田凯:《组织外形化: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64-75页。
- [22] 杨团:《中国慈善事业的伟大复兴》,见葛道顺、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 [23] 李培林、徐崇温、李林等:《当代西方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加拿大非营利组织考察报告》,《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第71-80页。
- [24] 李国林:《略论政府在社会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求实》2005年第5期,第53-56页。
- [25] 李迎生:《加快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州学刊》2006年第4期,第102-106页。
- [26] 程刚、韩红雨:《2017年中国基金会发展概况(1981—2017)》,见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6-131页。
- [27] 吴成、郭剑鸣:《慈善组织监管与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塑路径研究综述》,《财经论丛》2014年第11期,第88-96页。
- [28] 刘丽波、徐辉、杜志莹等:《汶川地震捐赠“铁公鸡排行榜”争议再调查》,2011年5月10日, <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1-05-10/095826233.html>, 2020年5月10日。
- [29] 田雪莹、叶明海:《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综述:现实发展和理论演进》,《科技与经济》2009年第1期,第60-63页。
- [30] 栗燕杰:《我国慈善税收优惠的现状、问题与因应——以慈善立法为背景》,《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93-97页。
- [31] 金锦萍:《权利与优惠:社会组织税收减免制度》,见王名主编:《中国社会组织(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1-96页。
- [32]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聚焦两会:近三年公益慈善议案聚焦慈善立法》,2014年3月5日, https://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3/05/34436975_0.shtml, 2020年3月10日。
- [33] 金锦萍:《〈慈善法〉实施后网络募捐的法律规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62-172页。
- [34] 邓国胜、陶泽:《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见邓国胜、陶泽主编:《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1-114页。
- [35] 刘怡仙、吴采倩、刘炜琳等:《社区基金会“空壳”困境:数量快速增长,现实仍需培育》,2019年10月20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61273>, 2020年3月30日。
- [36] 胡敏洁:《〈慈善法〉中的政府促进措施:支持抑或管理?》,《江淮论坛》2016年第4期,第16-20,31,193页。
- [37] 马剑银:《〈慈善法〉实施之观察(2016~2017)》,见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8-46页。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Charity Researches in China:

A Keywords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Ning Yumei¹ Lin Ka^{1,2}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Center of Social Welfare and Governan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n important issue faced by charity researches today concerns how to achieve a pertin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hased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harity studies. Existing researches made on the issue mainly attempted to reveal the features of this process in regard to the motivation of charity behaviors and relations among the agents and the systems. However, the major problems of these efforts are overwhelmed by the excessive subjectivity in the division of development phases, lack of empirical support, and shadowed with their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Given such

limitation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with its phases and features by reviewing research literature in rel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events of this process. A bulk of literature on charity issues is presented with interpretations on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of these events in this evolution. Based on frequency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keywords of the 1,774 academic papers indexed in CNKI between 1993 and 2019, we conclude with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enterprise of charity in China. The first phase of research (1993–2007)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the system development, which reflects the strength of the state-promoted nature of the Chinese philanthropy. The second phase (2008–2015) laid stress on the need of transparency, credibility and supervision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charity system. People began to have increasingly higher requirements regarding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charity, while charity on the whole has evolved from government-administration affairs to the field of public affairs with mass engagement. The current phase (from 2016 onward) is the third stage of evolution that strengthens the efforts of raising standard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charity activities, promoted by the newly published China's Charity Law, and the subjects of research are extended to issues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charity activities, online platform of charity, and philanthropy, etc. Meanwhile, this study also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into charity-related issues, which is able to supply empirical grounds and evidences to reveal the change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For instance, we compare the topic clusters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used keywords. A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is three-phase development charity research is mainly centered on three major issues, namely, charity system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corporate charity, less concerns are given to the key issues of philanthropy ethnics, voluntary behaviors and online charity at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s. The situations indicat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academic climate for the narrow scope of concerning but giving preferences in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charity activities. Still,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harity researches echo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arity action in China, but reflect the underlying changes in the Chinese philanthropy in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haritable behaviors, relationship among charity agents and charity systems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highlights the transition from “government-administrated charity” to “charity of public engagement”, as a result of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ultiple social subjects, while also reflecting some of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for charity development posed by the Internet era. It is anticipated that in the next phase of development, charity research will see its scope and research issues further extended,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will keep updated with the times.

Key words: philanthropy; public charity;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ocial administration;
social policy

